专 题

适应美国的“转向”与发展澳中关系

[澳] 威廉·陶（William Tow）

内容提要： 澳大利亚奉行“中等国家外交”，希望通过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参与地区多边机制等方式促进亚太地区秩序的构建。澳大利亚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澳中磋商机制不断发展，特别是澳中防务对话意义重大。澳美推进新的安全合作并非仅是针对中国崛起，而是为适应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新变化。澳中美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已较为成熟，可考虑设立三边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接受的、有利的安全关系。

关键词： 美国亚太战略 中美关系 中澳关系

很长时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希望在亚洲的安全政治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1995年，时任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Gareth Evans）宣称，“澳大利亚正积极为建立在与该地区邻国之间相互依存、依靠和信任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和接触’创造条件。我们绝对不想再犯过去的错误，澳大利亚在过去更多地将其邻国视作威胁而非机遇”。[1] 埃文斯成为后来为人所知晓的澳大利亚“中等国家外交”（middle power diplomacy）的先锋。十余年之后，澳大利亚处理国际关系的这种方式被陆克文（Kevin Rudd）总理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与地区邻国进行合作以强化亚太秩序的构建；二是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一道行动以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三是在“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有突出重要性的积极力量”的前提之上在政治和安全方

[澳] 威廉·陶（William Tow）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

1 Senator the Hon Gareth Evans, "Australia, China and the Region", address to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Victoria and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Victoria, Melbourne, 24 August 1995, www.dfat.gov.au/archive/speeches_old/minfor/geccc.html.

面继续成为美国的密切伙伴。[1] 澳大利亚现今执政的工党政府仍在实施这一三方面战略。

对于一些分析人士来说，这一政策的前两个方面似乎与第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直接矛盾。2011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美国将提升与其长期盟友澳大利亚之间的军事合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对此提出批评，耿坚持认为“历史上形成的军事同盟的任何加强或扩展都体现了冷战思维模式”。[2] 中国的分析人士吴建民在《人民日报》撰文重申了这一看法，认为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它们会压倒那些想要使中美陷入新冷战的力量。[3] 中国的立场是，如果所有相关国家愿意进行“和谐世界”式的外交，以最终实现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安全和平等为目标，采取一种综合外交与经济的多层面战略，地区安全就能够得到更好地实现。[4] 至少有一些澳大利亚的分析人士赞同这类看法。受人尊敬的军事问题专家休·怀特（Hugh White）将“奥巴马主义”称之为针对中国的当代的同盟遏制战略。然而，与和谐世界的方式不同，他赞成美国和中国与亚太其他主要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地区权力分享安排。[5] 这种安排可以通过双边关系的方式实现，但将在获取东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遇到难题，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通过东亚峰会之类的地区安全机制达成多边秩序构建规范和协定。

在塑造亚太安全政治方面，无论是“和谐世界”方式还是“权力分享”方式都需要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愿景上有足够的共识，以支撑这些方式的落实，而这是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中美之间却有足够的共同利益促使它们在核不扩散、国际贸易和金融以及反恐、救灾和疫病控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

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并不认为它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其总体上的中等国家外交之间有什么矛盾，反而认为这是对中等国家外交的一种补充，并否定那种认为澳美同盟关系是对反华遏制战略的一种支持的看法。在近期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比兹利（Kim Beazley）强调了这一点。他表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有利于亚太和全球海上商业活动的安全，从而促进了地区和国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比兹利进一步指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提供了一种保险，即保证了“领土问题可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得到解决，也可就在该地区如何管理

1 Kevin Rudd, remarks reprinted a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dvancing Australia's Interests", *webdiary*, 26 March 2008, webdiary.com.au/cms/?q=node/2318.

2 "China Rebukes US-Australian Alliance", *CNC World*, 1 December 2011, www.cncworld.tv/news/v_show/20250_China_rebukes_US-Australian_alliance.shtml.

3 Wu Jianmin, "Will Obama Doctrine Lead To New Cold War?" *People's Daily Online*, 18 December 2011.

4 Tsai Tung-Chieh, Hung Ming-Te and Tony Tai-Ting Liu,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Harmonious Worldview and its Impact On Good Neighbor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10(1) 2011, pp. 25-42.

5 Hugh White, "The Obama Doctrine", *Wall Street Journal*, 25 November 2011.

好的行为达成协议……这与遏制无关”。

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可以理解并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堪培拉和华盛顿都不“认为有权利去限制它，它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利益”。两国的确期望中国在强化通过“全球共同协商”而形成的法规和做法方面日益发挥核心作用。[1] 这种想法与澳大利亚的中等国家外交的总体观念是一致的，即明智地将本国的物质资产与安全伙伴的物质资产融合起来以支持地区和全球规范并在亚太和其他地区防范冲突。当中国的军事力量日渐增强时，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真心实意地期望北京能在保护中国主权利益的同时着眼于促进秩序构建与合作安全而动用其军事力量。

当中国的军事力量日渐增强时，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真心实意地期望北京能在保护中国主权利益的同时着眼于促进秩序构建与合作安全而动用其军事力量。

在更宽泛的地区安全和国际背景下评估自身利益和价值观方面，在运用中等国家外交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澳大利亚能获得多大成功，与当前存在的三个政策挑战相关。第一个挑战与中国和澳大利益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有关，这些对话机制之所以被创立，是为了处理与很多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有关的两国关系。第二个挑战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方面的变化中的立场有关，这些多边机制包括四边和三边战略对话以及东亚峰会。第三个挑战是，澳大利亚如何在加强与美国之间的防务联系和加强澳中关系的政策之间实现调和。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论及。

一、促进对话

自胡锦涛主席2007年访问澳大利亚以来，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建设协商渠道和提升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胡锦涛主席在澳洲之行中与霍华德总理宣布建立两国战略对话机制，自此以后，中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战略领域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明显增强。中澳战略对话与澳大利亚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类似对话是否具有同等分量或许是有争议的。[2] 但毋庸置疑，中国对澳大利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已经使澳政策制定者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属于他们所参与的最重要的磋商之列。

中澳双边战略对话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不同阶段。“澳中防务战略对话”在1997年启动，通常是澳国防部秘书长（代表国防部长）和国防部总司令与其中国

1 Beazley's interview appears in Eddie Walsh, “How Australia Sees America”, *The Diplomat*, 14 April 2012, the-diplomat.com/new-leaders-forum/2012/04/14/how-australia-sees-america/.

2 Robert Sutter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Myanmar Challenges China's Succes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October 2007, 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703qchina_southeastasia.pdf.

同事（通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进行议题广泛的会谈。在该会谈中，以防务合作为目标并得到协商的领域包括海上接触、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合作、高级官员访问、人员交流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维和合作。[1] 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在内的升级的年度战略对话于2008年2月在堪培拉举行，会谈涉及像朝鲜半岛、台湾（地区）、南太平洋岛国这类的敏感问题。2012年年初，中国驻澳大使陈育明在纪念中澳关系正常化40年周年的演讲中指出“战略对话机制仍在继续发展”。他将中澳防务战略协商机制描述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建立的最高级别的和最有成效的防务对话之一……这种深入的、坦诚的交流有助于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减少误判”。[2]

除了进行对话之外，中国和澳大利亚加快了它们的防务和安全合作。联合海军演习（包括2010年9月在中国沿岸地区举行的实弹演练）变得更为平常，联合救灾演习（2011年“合作精神”演习）近年也在四川举行。[3] 中国有超过3500名民事和军事人员在全球参与各种维和行动，澳大利亚对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显著增强的作用（中国目前参与维和行动的人员是最多的）表示敬意。[4] 澳大利亚的政策规划者将与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演习视为促进地区信心建设和提升军事透明度的重要部分。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演习扩展了军事外交的范围，促进了与澳大利亚这个美国盟国的互动，而澳大利亚可以接触美国“世界标准”的军事操作规程并为中国提供了在军事活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施展“软实力”的机会。[5] 当然，在这种双边互动中仍存在一种固有的竞争性成分。通过将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温和的安全伙伴展现给澳大利亚，中国希望借此反击美国，中国认为美国通过采取所谓“转向战略”来强化亚太战略角色从而变得更具进攻性。

---

1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13th Annual Australia-China Defence Strategic Dialogue Nantong, China”, Media Release, 17 December 2010, www.defence.gov.au/media/DepartmentalTpl.cfm?CurrentId=11232.

2 Chen Yuming, “Mutual Benefit Comes Only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 Inspiration from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Speech at the Defense and Security Luncheon Hosted by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2 February 2012, www.fmprc.gov.cn/eng/wjb/zwjg/zwbd/t908164.htm.

3 同上，另见Australian Minister of Defence, “Address to the Australian Member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urtin University, Perth, 10 November 2011, www.minister.defence.gov.au/2011/11/10/minister-for-defence-address-to-the-australian-member-committee-of-the-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

4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and the World (ACCW),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nd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Beijing, *Australia and China: A Joint Report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anberra and Beijing: ACCW and CICIR, February 2012, p. 34.

5 Wilson Chau, “Defence Cooperation: What Does Beijing Want?” *Lowy Interpreter*, 20 December 2011, 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1/12/20/Defence-cooperation-what-does-Beijing-want.aspx; Wilson Chau, ‘Explaining China’s Interpretation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xercises’, *Security Challenges*, 7(3) 2011, pp. 51-69.

中澳双边安全关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两国政府都认为双方需要地区稳定和繁荣，但两国在如何实现共同目标方面有时仍存在分歧。中国仍对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抱有猜忌，并对澳国防白皮书和其他官方政策宣示中关于澳未来与中国军事能力直接相关的国防开支方面的原因阐述持批评意见。中国对澳大利亚数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中国对澳投资的做法很不满。澳大利亚则对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外交举动及其在南海的军事姿态提出质疑。此外，澳大利亚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人权实践抱有关切，在连续几任澳政府看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和人权实践与澳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从属于中澳两方的一种共同认识，即一种总体上积极的中澳关系将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并可给予双方更好的机会来寻求和塑造对彼此都有好处的共同规范和利益。

一种总体上积极的中澳关系将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并可给予双方更好的机会来寻求和塑造对彼此都有好处的共同规范和利益。

二、追求多边安全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安全机制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在最初更倾向于以双边方式与地区邻国处理领土争端以及与预防性外交相关的问题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成为地区多边安全政治的关键参与者。当前，它对于地区融合或地区共同体构建并没有明确的大战略，但是已运用各种不同的多边主义手段来实现其短期的和实际的利益。澳大利亚已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亚太多边机制，近年来则就地区安全架构建设问题倡导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这一“宏大愿景”。这个倡议产生了不一的结果。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称，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和框架大部分已被东亚峰会所吸收；对该倡议的批评者则指出，澳大利亚在这一问题上最初缺乏与地区精英的协商，推介亚太共同体所暗含的前提是东盟在地区多边政治中的领导地位是不当的。[1] 此倡议突显了澳大利亚希望运用中等国家外交塑造地区秩序构建的长期趋势的决心，但正如下文将讨论的，胜过规范主义（normativism）的地缘政治扭曲了这一倡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重申了其对亚太地区双边同盟的承诺，并且不时地在东北亚（靠近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部署海军力量以抑制华盛顿所认为的朝鲜和中国的不当而危险的战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比以往更加积极地看待多边安全外交，并将其视做“减少美国军事压力的最佳途径”。[2] 抱着这种想法，中国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提出了它的“新安全观”，并在有关朝鲜半

1 Rowan Callick, "Dysfunctional Diplomacy", *The Australian*, 15 January 2010.

2 Taek Goo Kang, "Assessing China's Approach to Regional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4) 2010, pp. 407-408;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岛事务的六方会谈中承担起领导角色。这种更加广泛的参与多边安全外交的倾向有助于中国实现减少威胁的目标，中国要是通过动用自身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会更加没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增强，同时避免了与敌对国发生直接对抗所引发的伤害，这种对抗会带来各种风险。[1] 这种对于地区机制的谨慎的和强调相对收益的方式反驳了标准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即多边主义是一种固有的产生绝对收益的过程（通过对一种机制的相互参与，所有的机制追随者从长期看都会是赢家），以及独特的规则和规范可应用于所有机制参与者。[2] 与之相反，当中国认为通过多边方式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它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和主权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时，它就会这么做。中国的这种行为与冷战后几任美国政府所认为的那种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将本国在亚太地区对多边主义的追求描绘成意在促进"能够创造合作文化和实践的机制，与那种冲突文化和实践正相反"。[3] 这种做法与中等国家取向的哲学和行为是一致的。然而，澳大利亚对亚太共同体的倡导与自由制度主义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2010年12月被维基解密曝光的电报显示，在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简短会谈中，陆克文总理称，他之所以倡导亚太共同体，实际上是为了防范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从战略上被边缘化。陆克文还告诉克林顿，他本人"在对待中国方面是一个无情的现实主义者"。[4] 从这个例子看，如果独立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的政策更偏重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地区多边安全秩序的建设，他们是不会受到指责的。然而，一种更微妙的解释是，陆克文是在传统上澳大利亚对被其"伟大而有力的（美国）朋友"从战略上抛弃的担心和请求美国进一步致力于地区多边安全政治之间要手段。[5]

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政策可以被解释为将权力平衡和致力于制度构建复杂地混合在一起。

如果后一种解释是对的，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政策可以被解释为将权力平衡和致力于制度构建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以下几个方面至少部分地构成了澳大利亚的多边安全政策：

（1）与华盛顿合作，从而在保持传统上美国所领导的双边同盟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和促进地区机制下更多的信心建立和安全合作之间寻求明智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分散维持亚太安全的成本和责任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地区机制构建中成为不可或

1 Kang, "Assessing China's Approach", pp. 414-15.

2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The Hon Kevin Rudd MP, Former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Linda Mottram, ABC Radio Canberra", 28 October 2010, www.foreignminister.gov.au/transcripts/2010/kr_tr_101028_abc_radio_canberra.html.

4 Daniel Flitton, "Rudd the Butt of Wikileaks Expose", *Sydney Morning Herald*, 6 December 2010.

5 The classical study of Australian apprehensions re alliance abandonment is Alan Renouf's *The Frightened Country*, Melbourne: Macmillan 1979.

缺的参与者或“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追求应受到鼓励。

（2）在适当的场合，促进复合多边性（pluralateralist）反应（三个或四个“主导国家”对各种非传统安全突发事件和有选择地对某些传统安全突发事件协调作出反应），作为与日本等长期伙伴一道实现合作安全的途径。这些“以非国家性威胁为中心”的议题涵盖自然灾害、疫病、恐怖主义和海事安全，以及需与“同盟辐条”框架之外的其他亚太国家协调应对的问题。

（3）以着眼于促进地区信心建设和防范未来破坏亚太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冲击性事件”（shock）的方式，与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合作。这类“冲击性事件”可能包括朝鲜半岛再次爆发会影响整个东北亚地区（澳大利亚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与该地区有关）的冲突，全球性的石油危机或在中东/波斯湾地区爆发并波及亚洲的军事危机，东海再次出现紧张情势，南海紧张情势加剧，或者是南亚、东北亚或（可能性较小）东南亚出现利用恐怖主义、核武器或封锁海上要道这类威胁手段的失败国家。

因此，对于澳大利亚和中国来说，关键的挑战在于，在尽可能推动真正的共同体建设与尽可能降低地区紧张和对抗的共同目标之下，促进多边主义的安全政治。两国在这样做的同时，仍要尊重彼此关于在特定时间和情况下哪种多边机制应居于优先地位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处理方式。因此，澳大利亚必须认同（accord）中国发展上海合作组织、“10+3”或中日韩峰会等没有澳大利亚参与的机制的权利。反过来，中国不应反对澳大利亚将其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参与和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集体安全的较新形式融合起来的权利。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政策的契合之处在于，引导地区同盟关系远离威胁应对战略并更多偏向秩序构建的共同需求。一个单一的、权威的，能缓和亚太地区各国国家安全利益差异的地区架构当前并不存在，它也不会很快出现。未来的地区权力分配将主要取决于经济上的发展趋势，（各国）在外交上应对结构性变化的相对一致性，以及受各国意图、能力和对他国预期影响的（各国之间关系的）透明度水平。[1]

对于澳大利亚和中国来说，关键的挑战在于，在尽可能推动真正的共同体建设与尽可能降低地区紧张和对抗的共同目标之下，促进多边主义的安全政治。

三、适应（美国的）“转向”

2011年11月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美国将从2012年开始小规模地在达尔文附近轮换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12年的250人开始至2016年扩大到

1 Malcolm Cook, Raoul Heinrichs, Rory Medcalf and Andrew Shearer, *Power and Choice: Asian Security Futures*, Sydne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MacArthur Foundation, 2010, pp. 77-79.

2500人。对美国这一举动的反应各不相同，但对于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问题是，澳大利亚在何种程度上能在适应美国在澳和印度洋 - 太平洋主要沿岸地区扩大战略存在的同时与中国维持切实可行的关系？

只要有益于双边关系的互动是符合中国和澳大利亚利益的，中澳双边关系就仍会保持健康。美国的政策规划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不打算对澳大利亚施加过度影响以至于美国与这个澳洲盟友的关系被认为是为了边缘化或遏制中国。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稳定的和持久的中澳双边关系，这一关系是亚太地区发展和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时强调了美国的这一立场，“关于我们害怕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关于我们想要排斥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欢迎一个崛起的、和平的中国”。然而，奥巴马对上述宣示做出了限定，他警告说，“对于他们（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按照规则办事，并帮助强化这些让（他们）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进步的规则”。[1] 因此，美国在该地区提升战略存在的动作可被视为一种主动，即确保美国以一个关键力量的身份参与该地区的秩序构建和繁荣，并被该地区国家认为是承担这种角色而非想要遏制或边缘化该地区的其他力量。华盛顿面临的挑战在于，它在此时做出这一举动是颇为困难的，考虑到美国增长的国家债务、高失业率和老旧的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问题正是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核心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它的澳大利亚盟友可以分担的。

澳大利亚决定支持美国的“转向”战略更多是因为一种对地区和国家安全政治中结构性变化的更为宽泛的地缘政治角度考量，而不是仅仅出于对崛起的中国的关注。

澳大利亚决定支持美国的“转向”战略更多是因为一种对地区和国家安全政治中结构性变化的更为宽泛的地缘政治角度考量，而不是仅仅出于对崛起的中国的关注。正如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分析人士所指出的，亚洲是“印度洋—太平洋大体系”的一部分，世界的大部分能源供应和商业流动是在这个大体系中展开的。作为该地区二等的海上力量，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处于该体系之中。然而，人口的有限规模（仅有约2300万人口）加上相对低水平的国防开支，要求澳大利亚与美国、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海洋国家合作建立“印度洋—太平洋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中国并不是必然受到排斥，但它需要同意接受将其他相关国家联结起来的那些战略目标和规范层面的价值观，进而被这个更广的网络所接纳。[2]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在达尔文，此处可被视为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叉点，这一部署符合正在演进中的美国“空海一体战理论”。该理论强调要把

1 “Obama Boosts U.S. Military in Australia, Reassures China”, *Reuters*, 16 November 2011, 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1/16/us-usa-australia-idUSTRE7AF0F220111116.

2 Rory Medcalf, “Our Chance to Align With the US Pivot Point”, *The Australian*, 15 November 2011.

美国的离岸军事力量（空军和海军）分散到该地区在战略上不太脆弱的地方，并使其更便利地进入印度洋 - 太平洋地带中的港口、训练基地和其他设施，为的是提高部队在该行动区域的快速反应力和灵活性。据称，将一些美国军事设施重新部署在澳大利亚以促进美军这种能力的计划已经完备。[1]

至少有一些澳大利亚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美国变得仅对反制中国军事能力过于着迷的话，澳大利亚需要看到美国这一战略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如果这种过度着迷成为现实，澳大利亚作出主权决策的独立性就会陷入威胁。[2] 既获取美国情报、防务技术和训练合作，又保持这种独立性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西兰在核威慑政策上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加深时所表现的那样。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或将会提供给澳大利亚如今从维持同盟关系中所获得的安全保障和好处。中国或其他国家想要利用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来影响澳的防务关系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美国的同盟关系并没有直接威胁中国的根本国家安全利益，中国最好是从双边关系本身的好处出发发展同澳大利亚的关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针对中国的“澳新美威胁”已经出现或是将会很快出现。

关于美国在达尔文驻军的决定有什么实际的战略影响呢？总体看，它不应当被解读为从实质上改变了地区的权力平衡，虽然它具有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数千人的陆战队间歇性地部署在此，距中国边境或日本海和南海的争议水域数千公里，这不会对中国造成直接威胁。甚至，正如梅德卡夫（Rory Medcalf）所言，在未来出现中美危机时，这样一支分遣部队在封锁从印度洋到中国的石油供应方面只会发挥很小的补充性作用。[3] 此外，澳大利亚不用担心很快会出现一种威胁性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将会或能够入侵澳大利亚），因此，澳大利亚在允许美国从澳海岸投射重要军事力量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利益。相应地，任何从澳大利亚展开的美军行动应是低调的。关于美国潜艇将最终被部署在靠近罗金厄姆（Rockingham）的澳大利亚西部海军基地（HMAS Stirling）的报道，关于美国的长程轰炸机将逐渐使用德拉马雷（Delamare）空军训练场的报道，常常没有充分注意到，在澳新美同盟行动中这种做法一直以来都是很平常的。

结 论

在其有关知觉在塑造国际关系决策者观念的作用的经典研究中，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言，在不采取措施提升“规范可靠的情报”针对“无根据的意

1 Rory Medcalf, "Obama in Australia: Balancing not Containment", *Foreign Policy*, 16 December 2011, 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obama-in-australia-balancing-not-containment/.

2 Peter Leahy, "Australia Can't Get Too Close to the U.S.", *The Australian*, 12 April 2012.

3 Medcalf, "Obama in Australia".

象”的优势的情况下，实行一项严谨有力的政策是不可能的。[1] 从历史上看，在缺少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采信最坏情形的分析导致了悲剧性的冲突，这也是亚太地区国家的政策精英必须明确避免的一种当前存在的危险。中国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避免就澳大利亚为何在促进奥巴马主义实施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作出不成熟的结论。反过来，澳大利亚必须投入实实在在的努力来让北京相信，当美国减少其在阿富汗和中东的军事存在时，中国的战略利益并不会因澳新美的更大合作而受到危害。美国需要在表明以下信息方面比过去更具说服力，即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而是要在塑造新的亚太安全秩序方面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反过来，中国需要采纳杰维斯的建议，通过更愿考虑处理朝鲜半岛、南海和其他地区危机的政策替代方案来避免错误的知觉。

亚太地区稳定的未来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是，为彼此之间就各自的利益和关切进行交流而维持和扩展既有的对话，并寻求新的对话。有充分理由认为，当前，中澳、中美和澳美这三组双边关系已足够成熟，以至于考虑建立三边安全对话来讨论诸如能源和资源获取、核不扩散、救灾之类相互关心的问题是恰当的。这种三边对话有助于增强那些包含三国在内的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无论三国之间的未来对话会如何展开，三国都需要发展相互接受的、对彼此有利的安全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在亚太地区避免不可接受的、危险的安全困境是重要的。

（凌岳　译；李潇潇　校）

1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